

文学批评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田 义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之一,是批评家对创作者隐喻于文学文本中的创作诗学的逻辑归纳和理性概括。其反对理性诗学式的纯粹理性化,强调回归文学文本自身,恢复诗学的诗性思维;主张通过文本细读法和兴辞诗学法重建诗学形态,以走出当下诗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

[关键词] 本文诗学;理性诗学;文学批评;文本细读法;兴辞诗学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6-0096-06

Plight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Textual Poetics

TIAN Yi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xtual poetics is one of the original forms of poetics, and it is the critic's logic induction and rational generalization of creation poetics in the literary texts. The textual poetics has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purely rational logic thinking of the rational poetics, which emphasizes the regression of literature text itself, and the restoring of poetic thinking. It also proposes to reconstruct the poetic form by the close reading method and XingCi poetics method, so as to solve the plight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poetics.

Key words: textual poetics; rational poetics; literature criticism; close reading; Xingci poetics method

新世纪初期, J·希利斯·米勒就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阐述这样的观点:“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1]在米勒看来,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单纯的文学研究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文学即将走向终结。关于“文学终结论”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在理论大师米勒看来,其与电信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正是新的传播媒介的引入使得文学产生因素走向终结,“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力联系在一起”^[1],而“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1]。有关“文学终结”的争论一时成为学术界的焦点,许多学者

纷纷撰文表达对“文学终结论”的看法,但迄今也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米勒观点背后隐藏着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文学和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已陷入困境。这种诗学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诗学自身专属性问题。在艾布拉姆斯看来,文学是由作者、世界、作品和读者四部分构成的,美国学者刘若愚也是在此基础上重新排序,对四部分特别是世界(宇宙)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重新阐述,可见,文学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诗学的建构都应该是以所有组成部分为基础的。但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诗学并没有按照文学自身的统一性而建构,而是以其中某一部分为专属研究而存在,诸如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和活跃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理论,都是以文本为基础建构而成的诗学形态。由于

收稿日期: 2014-03-23

作者简介: 田 义(1988-),男,河北唐山人,温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和西方文论。

诗学自身具有专属性,必然在具体解释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过程中忽略其他部分的存在价值,因此无法从整体上作出合理全面的回答。其次,诗学自身哲理化问题。诗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脱离文学自身转向单纯依赖“形而上”思辨的趋势,即远离文学自身依靠诗学史运用抽象逻辑和归纳演绎的方法衍生出新的诗学理论,诗学从根本上与哲学结为同盟,哲理化和逻辑化的趋势日渐显著。依靠思辨方法建构的诗学难以有效给予作家创作指导,具有抽象性质的诗学更难以针对具体文学现象作出科学的批评,诗学由此丧失了自身应有的价值,不再受到创作者和批评家的信任。最后,诗学自身扩大化问题。新世纪以来,诗学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力度明显不足,诸如米勒文中提到的电信时代的到来,图像带来的视觉享受对文字的霸主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借助电子媒介产生的新文学类型更是在新世纪掀起了巨大的文学浪潮。对于这些现象,传统的诗学在解释过程中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学者提出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元理论”^[2]已经过时,应该为文化研究所取代;有些学者则提出文学理论应该坚持以文学为研究对象,文化研究不能也不应该取代文学研究,如乔纳森·卡勒说:“如今当人们抱怨文学研究的理论太多了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说关于文学性质方面的系统思考和评论太多了……而是非文学的讨论太多了,是关于综合性问题的争辩太多了,而这些问题与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3]言外之意是说,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已经混淆彼此间的界线杂糅在一起,并且引起概念、命题和理论的混乱。诗学在新世纪面临着文化研究的挑战,如果诗学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合理的解决学科争端,那么势必不利于诗学自身的长远发展。对于第三重困境需要传统诗学和文化研究共同调整研究对象才能解决,不属于本文探讨内容。而对于第一重和第二重困境来说,能否找到一种既从创作者角度出发又与批评家相联系的诗学建构方法,就成为解决诗学困境的关键性因素。对此,笔者追寻诗学传统,通过对诗学原初形态的考察,基于文学整体统一性的考虑,建构一种既立足于作家创作又与批评家相联系的诗学形态——“本文诗学”。^[4]

一 诗学的演变历程与本文诗学的特征

诗学陷入困境的原因不在于文学是否会消亡,而在于诗学自身建构的方式。目前诗学主要的建构方式是运用“形而上”思辨的方法,即通过抽象思维对浩瀚的诗学史进行逻辑推演从而生成新的理论来完成诗学自身的建构。不可否认,康德、黑格尔和席勒式的思辨理性对诗学逻辑性和体系性方

面的建构有很大的启示,但是,这样的建构方式同样封闭了诗学拓展的空间,诗学渐渐呈现出“宏大叙事”和天马行空任意似的发展状态,脱离了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理论不再具有指导作家创作和供批评家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也失去了诗性思维,只留下灰色的理性。因此,诗学建构方式应该由目前的“形而上”更多的转向“形而下”,不再只是单纯依靠理性思维进行抽象演绎,而是以具体文本为建构基础,回归文学自身,通过对文本的积累和判断,提炼诗学理论,按这种方式建构的诗学就是“本文诗学”。从诗学史的角度来看,本文诗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而是诗学的原初形态之一,有着古老的历史传统;本文诗学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体验和无意识隐喻的诗学,也是创作者的自由意识和自觉意识地表达,由于创作者将自己的诗学范式融汇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批评家就可以从文本中概括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指出“本文诗学”不同于“文本诗学”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本文诗学虽然是以文本为基础建构而成的,但这种建构基础并不只是依赖当前文本,而是要从整体文本入手,即尽可能依靠较多的文本资料,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诗学》就失去了建构的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文本诗学更专注于某一具体的文本,因此,文本诗学不具有诗学理论的共同品格,不具备普遍性和共通性的文本诗学很难有效指导作家创作,更难以用一种宏观角度去诠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另一方面,本文诗学既能指导作家进行创作,又能为批评家提供理论支持,是以整体文学为基础建构而成的诗学体系,有效地沟通了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批评家)。并且,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这四部分处在共生互动的关系之中,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本文诗学也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同于本文诗学,文本诗学在建构过程中,受某一具体文本限制,文学“四要素”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无法进行有效地沟通,导致文本诗学难以维系发展。

从诗学演变历程来看,人类诗学发展源头是“口头诗学”。^[5]这种诗学产生的原因与古代文学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最初的文学起源于古人的口头创作,流传的方式也要依靠口头传播,诸如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无论是创作还是传播都是以口头的形式展开进行的,口头诗学就是源自于口头诗人的口头创作,诗人的口头创作一方面要遵循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适合口头表达的文学语言,在弗里看来,“口

头创作利用了日常语言交流形式,同时也打破了日常语言形式的实用性和琐碎性的特性”,因而在口头诗学中,有关“唱诵和叙述”的阐述就成为其主要特征,可见,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构成了最初文学文本,这对于口头诗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文学有了确定化的书面文本,人们首次可以“触摸”到文学,因此,批评家可以搜集尽可能多的文学文本,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文学的载体由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的转化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使得文学最终以物化的形式得以确定,正是这种具有确定性的文学文本才促使本文诗学的诞生。然而在诗学建构过程中,文艺理论家将诗学建构方式推演到极端,脱离了文学自身,走上了诗学的纯粹理性化道路,更加突出诗学的思辨精神,诗学不再具有诗性思维,诗学在发展过程中又一次发生偏转,由本文诗学转向了理性诗学。总之,诗学的发展历程由最初的口头诗学向本文诗学转变,随后本文诗学又转向理性诗学。本文诗学作为诗学的原初形态之一,不同于其他诗学形态,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本源意义上说,本文诗学具有“互理性”特征。所谓“互理性”是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罗兰·巴尔特和朱丽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概念一脉相承的。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任何作品的本文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6]罗兰·巴尔特也曾这样论述过,“作者创造了文本不过是一个假象。事实上,特定文本由多个写作构成,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起源,它来自多种文化、文学文本的相互对话、结合、戏仿甚至冲突”。^[7]在他们看来,文本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与历史文化和其他文本有着紧密联系的,文本的生成在于自身的开放性。同样,本文诗学自身也具有开放性特征,一方面,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实验尝试,包括文体实验、语言实验、形式实验和修辞实验等等相关的实验尝试,目的在于能够选择一种适合创作者表达审美意识和艺术独创性的体系。同时,由于创作经验的累积,作者无意识中形成了创作法则和创作规律,隐喻于具体的文本创作中。创作者的有意识尝试和无意识隐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一种开放性的体系中,创作者的诗学理念和诗学规律不断发生变化,不断促进创作者个人创作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本文诗学在建构过程中需要批评家回归文学本身,挖掘隐喻于文本创作中的诗学理论,批

评家总是试图以完全归纳法去搜集、整理、概括和分析文本,因此,文本的自由选择使得本文诗学带有了开放性的特征;同时,批评家在建构本文诗学的过程中,经过逻辑推演和归纳演绎的诗学具有共同品格,并不局限在对某一部分的诠释,而是高屋建瓴似地给予指导,本文诗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化理论,而是处在不断更新变化过程中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诗学具有“互理性”特征,是一个开放性的范式,与创作者日新月异的创作变化和批评家求全责备的态度相关。

其次,从功能作用来看,本文诗学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本文诗学作为一种诗学形态,既具有理性化和逻辑化的特征,又呈现出批评化的倾向。本文诗学的建构方式与理性诗学的建构方式不同,不是从逻辑起点开始推演,而是真正回归到文学文本中去,批评家在具体的文本批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整理、分析和思考,是一种概括提炼出来的诗学理论。读者对本文诗学的认知必须以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为研究对象,在对批评文本的解读中寻求批评家的思想路线,探寻批评家是如何分析文本、研究文本以及解构文本从而建构本文诗学思想的,因此,对于读者而言,对本文诗学的认知过程就是一次对文本的再批评的过程。我们通常认为,文学理论是作为对文学自身的一种反思而存在的,是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普遍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具体上升到普遍,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推演过程,焦点集中于共性;而文学批评则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解读过程,是将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它更加关注的是个别性和具体性。由此可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本来就存在着天然的屏障,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本文诗学作为一种既保留诗学的理性化,又呈现出批评化倾向的诗学就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本文诗学的主要建构者是批评家,批评家在整理文本、分析文本和解构文本中建构本文诗学。其实,在整个建构过程中,批评家更多的扮演着作家的角色,要不断揣摩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作家的创作观念,解析作家的创作经验,因此,本文诗学既具有一般诗学的逻辑性和理论性。同时,这种诗学自身又具有可操作性,能够有效地诠释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创作问题,为解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剂“良药”。

最后,从审美角度来讲,本文诗学具有历史传承性和个体差异性的特征。第一,人类最初的文学主要依靠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口头文学首先必须符合文学自身内在的创作规律,其次还要创作出适合口头传播的文学语言,记忆和回忆就成为口头文

学非常重要的创作律法,由于口头文学没有以物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因此,记忆和回忆能够使口头文学的创作延续下去,口头诗学就是建立在这种特殊的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印刷术的出现使文学能够以物化的形态表现出来,本文诗学就是建构在这种确定化的文学文本上,创作者的诗学理论能够永恒化,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文学文本导致诗学研究存在漏洞,创作本身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体验基础。口头诗学与本文诗学都要依赖于具体的文学文本,不同之处在于口头诗学所依赖的文学文本没有以物化的形式出现,并且,本文诗学定型化之路使得口头诗学日益衰微。但是,二者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并没有出现断裂,文学自身内在的创作规律和创作者自由自觉的诗学观念仍然是本文诗学重要的研究内容。第二,本文诗学存在个体性差异的特征,也就是存在主体间性的差异。由于每个创作者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意识都不尽相同,因此隐喻于文学文本中的诗学理论也就不尽相同。不仅主体间诗学理论存在差异,而且,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创作者在有意识体验和无意识隐喻过程中,每个人的诗学理论也都在发生着改变。个体性的差异还体现在批评家个人创造性的差异上,因为批评家受不同的价值影响,对同一文本的阐释也就有着不同的视角,因而产生的本文诗学也是不同的。本文诗学就是呼唤每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批评家深入到文本的深处,去发现文本的共同品格,用自己独创性的视角去构建成具有逻辑性的诗学原理,本文诗学体现着创作者和批评家独特的个性和创新性。

二 本文诗学重建的方法与途径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本文诗学是回归于文本、来源于文本的诗学,现在我们要追问如何能够在具体的文本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思想?或者说,我们能否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试图用完全归纳法概括古希腊时期的所有文本呢?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一方面,两千年前的文学并没有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从文化范围内分离出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专职人员和纯文学性的作品数量有限,如今时过境迁,情形迥异,我们无法去研究数以万计的作品和创作者;另一方面,诗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厚重的诗学史也是我们重建本文诗学的重要基础,本文诗学并不排斥抽象思维和逻辑推演,反对的是诗学的纯粹理性化。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总结了两种方法来重建本文诗学,分别是文本细读法和兴辞诗学法。

1. 文本细读法:“细读法”是新批评创造的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它建立在对文本语义细致分

析的基础上,力求对文学作品中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8]但是,新批评的“细读法”更多的是对诗歌中的词语尤其是中心词的直接意义及所有内涵意义的分析和解释,集中分析词语的含混、反讽、隐喻和张力等手法,这些分析都停留在语言层面上,未能对文本作更深入的研究,因此,英美新批评提出的“细读法”并不是重建本文诗学的具体方法。笔者所谓的文本细读法,具体来讲就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透过语言层面,深入到文本结构的深层中去把握作品所蕴涵的诗学思想。诸如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作品的细读,从而分析出拉伯雷作品中隐喻的“狂欢化”诗学思想。巴赫金首先在《拉伯雷研究》一书中指出:“拉伯雷是很难研究的。然而,只要他的作品能够得以正确的揭示,人们就能够从中窥见民间诙谐文化数千年的发展……他的小说应该成为开启尚少研究和几乎完全未被理解的民间诙谐创作巨大宝库的一把钥匙”。^{[9]4}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的小说作品中隐喻着“狂欢化”的诗学思想,所谓的“狂欢化”诗学思想,就是狂欢节型庆典活动的礼仪、形式等的总和。巴赫金认为深入研究拉伯雷的小说,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真正内涵,这主要是针对当代学者套用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审美观念去歪曲理解民间诙谐文化的独特本性这一现象提出的,这就说明巴赫金在分析“狂欢化”理论时考虑到历史语境的问题,没有以现代人的眼光妄作批判,而是真正回归文本,回归历史情境,透过文本表层逐层分析“狂欢化”思想的具体内涵。其次,巴赫金通过拉伯雷小说中的广场语言、民间节日的形式与形象、筵席形象、怪诞人体形象及其来源和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的描写来提炼作品中的“狂欢化”诗学思想。例如在“广场语言”一章中,拉伯雷小说有这样的描写,“阿尔奇比亚代斯说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因为从外表看……他确实生得太丑陋了,形象可笑,尖鼻子、牛眼睛、疯子面孔、行动率直、衣饰粗俗……超人的悟性,神奇的品德,百折不挠的勇气”。^{[9]324}巴赫金从这段描写中发现,对于苏格拉底外表的描写并没有偏离原型,但是这种“选词用句和堆砌词语就使这种描写近似于辱骂……对苏格拉底内在品质的描述则大肆铺陈,有点近似歌功颂德”,^{[9]408}随后巴赫金进一步阐释辱骂和赞美的具体所指,辱骂就是死亡,逝去的青春走向衰老,但隆冬过后就是春天,死亡过后即是复活,辱骂和赞美是两位一体世界的两面,这样的语言就是民间诙谐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广场语言,广场的辱骂和赞美是整个言语的基本推动力。巴赫金就是从这种带有巨大张力的

描写中发现了广场语言,在狂欢节的广场上,暂时取消了人们间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出现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但是,仅仅是对广场语言的分析并不能全面诠释“狂欢化”的诗学理论,巴赫金继而又在“民间节日的形式与形象”一章中列举了拉伯雷小说中打架和斗殴的描写场面,“约翰修士抡起棍子对准红鼻子的脊梁、肚子、胳膊、腿、头,浑身上下打了一个不亦乐乎”,透过表层的斗殴场面,巴赫金认为这里的殴打不再具有日常的、个人的性质,而成为一种象征行为,象征着对“国王”的脱冕,即全民狂欢,全民用辱骂和殴打的形式向旧权力、关于垂死世界的真理发起挑战,这种全民式的狂化是与殴打场面混淆在拉伯雷的小说中的。巴赫金还在“物质——肉体下部形象”一章中发现拉伯雷小说中一切形象向下运动的规律,例如“有一次我拿一位宫女的丝绒护面擦屁股,觉得很好,因为丝绒柔软,使我的肛门非常舒服”。^{[9]231}巴赫金认为这种向下的描写既不是粗野的现实主义,更不是对禁欲主义的反动,而是民间诙谐文化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象观念,是一种特殊审美观念的遗产。这种向下描写属于全体人民,也正是这种全民性决定了物质—肉体生活的形象具有一种特别欢快的和节庆的性质。巴赫金正是通过对拉伯雷小说文本的细读,建立了一套新的诗学理论——“狂欢化”诗学范式,并由此开辟了一条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通向”抽象理论建构的本文诗学之路。

2. 兴辞诗学法。兴辞诗学是王一川先生提出的一种诗学建构方式,是“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感兴’(体验)传统与‘修辞’传统的现代融汇”,^[10]兴辞诗学强调从文学文本中寻求蕴藉于对社会生活状况体验的个人生存体验,并且把这种注重个体体验的感兴论与突出特定语境中的语言效果的修辞论两者融汇起来。在王一川看来,西方文论中的多数修辞手法只是中国古典文论中“比”的方式,而“兴”的自然感发之作用是值得重视的。不过,王一川的兴辞诗学法原本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基础的,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特有方法,并不完全适合当今诗学发展现状,其运用不仅是要改变历史文化语境,更要改变“兴”的方式与“辞”的内容。具体方法如下:首先,回归文学文本,唤起直接的个体感兴,这种感兴倾向于批评家的直觉或者瞬间印象,重视内心感受和体悟,反对理性批评;其次作具体的文本修辞细读,这里提到的修辞不仅包括含混、反讽、张力和隐喻,还包括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等广义上的修辞手法,从而揭示文本语言的个别或特色,继而透过表层语言,为文本意义及意蕴阐释提供语言

基础;再次根据对文本的感兴及语言的独特性的分析,建构起与之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阐释模式;最后把上述文本感兴与语言特色带入具体的语境中加以阐释,发现文本的深层的诗学内涵。并且,兴辞诗学并不局限于逻辑严密的学术论著作,而更愿采用富于文采的点评体甚至诗体,例如我国古代孔子评《诗经》留下的“片言只语”,金圣叹、毛宗岗对白话长篇小说的批评仅仅“点到即止”,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用文采华美的散文形式即可完成对古希腊悲剧的分析。从这里可以看出,兴辞诗学是与具体文本紧密相连的诗学建构方式,重在批评家个人的体验和提炼,同样具有较强的理论品格,但是这种诗学品质又是与具体的批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本文诗学建构的特征,因而也是本文诗学重建的一种方法。

三 本文诗学与文学批评的互补

关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界定,韦勒克与沃伦作了如下的论述:“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是‘文学批评’(其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的)或看成‘文学史’”。^[11]换句话说讲,文学理论是指研究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常被视作是对具体作家与作品的个别研究,但二者并不处于彼此对立的状态,而是互相依存、相互联系的。王一川就指出过:“从文学理论来看,当其传统的普遍性指导权威衰落而具体性受到重视时,重心必然向以具体见长的文学批评偏移,直到演变为以文学批评的形态而寻求新的存在”。^[10]文学批评同样要依赖于文学理论,从普遍理论推演到个别作品。可见,二者处于紧密联系的状态中,那么当诗学陷入困境时,以诗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也难以逃脱困境的噩运,具体表现为:(1)文学批评的自身矛盾。文学批评既是一种科学的认知活动,也是一种审美评价活动,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批评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确切地讲,文学批评是奠基于审美鉴赏之上的一种认知活动。前者是文学批评的前提,没有审美鉴赏,就没有文学批评的发生;后者是文学批评的展开,没有认知活动,文学批评就会陷入混乱。一般而言,二者保持了统一,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就因为鉴赏与评价诗人的不同风格而名垂不朽。但是二者也常常处于分离状态,如胡适的《尝试集》,如果仅从审美角度来谈论其艺术风格时,那么诗集本身缺乏新意,语言、意象、修辞没有达到优秀诗歌应有的水平。但是,从认知角度而言,它是新诗的尝试之作,在解放韵律、

语言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这部诗集在新诗史上又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由此可知,文学批评具有自身矛盾的问题。(2)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僭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文学理论取代文学批评的局面,表征是从事文学研究的,纷纷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批评中抽身出来,加入了对于文学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中,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一些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研读,而是对文学作为社会关系与学科关系中这一复杂地位的一般性关注与解释,如对电影、电视、网络媒介的研究,甚至出现了“对街心公园、雕像等文化的阐释,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二者甚至出现了理论、概念和命题的混淆现象,长此以往,不利于双方学科的发展。”(3)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学科分工的困境。在西方,采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合一的方式,彼此互不分离,很多学者既是理论家又是批评家,如韦勒克、布迪厄和德里达等。但是,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属于不同的学科分工,这就使得文艺研究者不自觉地疏远了文学批评。更糟糕的是,对于文艺研究者来讲,具体的文学作品不是作为阐释和评价的对象,而是作为说明和论证作者理论观点的对象,理论家固步自封地从哲学命题中推演建构着自己的体系,而忽视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其构建的诗学体系虽然气势恢宏,但只是思辨哲学体系的扩展,无法阐释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这必然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脱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差距越来越大。文学批评陷入困境既有自身的内部原因,又有外部的原因,笔者立足于本文诗学,试图探讨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文诗学是建构于具体文学文本的诗学思想,是作为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反思而存在的,因此,文学批评同样应该回归于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固守残缺”,在与文化批评“泾渭分明”的基础上回归于文学本身。本文诗学的主要建构者是批评家,批评家在文本中寻求作家个人诗学的共同品格,既要“从审美角度概括创作律法,又要以科学认知的态度探索诗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紧密联系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审美鉴赏与认知判断结合的实践活动,“在成功的批评家那里,它们是有机的、共生的、统一的,创造者批评的辉煌”;^[10]对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脱节的问题,很少有人提出鲜明有效的解决方案,王一川先生曾提出过“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主张,但

是,这一主张着眼于两者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并没有就问题本身提出解决办法,而且王一川立足于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就降低了理论的水平。本文诗学的建构能够填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鸿沟,本文诗学是从具体文本中建构起来的一种诗学思想,它立足于个别的文本,但是呈现的诗学思想是具有普遍性的,区别于纯粹理性化的诗学思想的地方在于能够从普遍推导到个别,能够为批评家提供诗学思想去诠释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回归于文学本身,从而达到沟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目的。

基于以上所有分析,考虑到目前诗学和文学批评遭遇困境的尴尬局面,笔者认为,本文诗学是一种真正回归于文本的诗学思想,能够解决目前诗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困境。真正从文学文本出发,在文本中发现创作者隐喻于创作文本中的原创性诗学思想,我们不仅可以迎来文学理论的春天,更能够唤起文学创作的激情,这不正是诗学解释与文学创作的真正目的吗?

参考文献:

- [1]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1):131-139.
- [2] 苏宏斌.文化研究的兴起于文学理论的未来[J].文艺研究,2005(9):37-44.
- [3]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
- [4] 胡友峰.本文诗学: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J].新疆大学学报,2006(1):114-119.
- [5]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
- [6] 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
- [7] 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M].杨扬,译.文艺理论研究,1988(5):53-57.
- [8]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81.
- [9]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10] 王一川.理论的批评化——在走向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J].文艺争鸣,2005(2):14-18.
- [1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31.

责任编辑:黄声波